

# 世界史与全球史视阈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毕世鸿\*\*

**摘要：**在区域国别学中，世界史既是其重要基础，也是其重要的学科交叉对象。“国别”和“区域”是构成区域国别学科历史研究的车之两轮。世界史学科自从诞生之日起，更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并发展壮大。学者们在运用世界史研究方法论述区域国别的历史时，会基于现代视角，大量使用现代的知识、概念和语言。世界史及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方向在于，关注人类集团之间的关系或相关性，重视采取“接续的历史”方法；尝试排除中心性，即在考察区域国别历史时，不以特定区域为中心，尽可能平等看待所有区域和人类；基于“地球村居民”的立场和视角，发现和强调各区域、各国的共同点；在巩固“纵向历史”的基础上，加强“横向历史”的研究，以回归宏大叙事。在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握聚焦重要问题和真问题、谨守“论从史出”、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复杂性、善用比较研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等原则。通过采用全球史等研究方法，将能更好地

---

\* 本文为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建设项目；国家级高端智库与教育部新型智库培育建设（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项目；云南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质量提升计划（CZ22622202）的阶段性成果。

\*\* 毕世鸿，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学博士。

促进区域国别研究和世界史学科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世界史；全球史；跨国史；接续的历史

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中国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原为二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是以国别为基础，扩大到区域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全方位研究。<sup>①</sup>而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历史学通常被认为是其重要基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历史学一级学科调整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在世界史一级学科下，又设置了“世界地区与国别史”等研究方向。“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主要研究世界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历史，特别关注不同区域和国家历史的特点与不同发展道路，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sup>②</sup>上述政策性安排，为区域国别学和世界史等学科紧密配合、联合开展跨学科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发达国家的学术体系中，区域国别研究很早就采纳了世界史学科的范式及其方法，从而为形成对对象区域国别的“深层经验知识”打下基础，也成为本国政府决策的重要学术资源。对所有国家而言，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他国动向密切相关，反之亦然，这是因为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世界”的存在。我们要关注区域的概念，因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需要发现区域国别的多样性和共同性，从而丰富我们对世界史的整体理解。另一方面，我们所拥有的

---

① 钱乘旦：《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该怎么做？》，2022年3月20日，[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203/t20220320\\_5399647.shtml](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203/t20220320_5399647.shtml)。

② “世界史一级学科简介”，2013年11月20日，[http://iwh.cssn.cn/wz/201311/t20131120\\_5225663.shtml](http://iwh.cssn.cn/wz/201311/t20131120_5225663.shtml)。

区域国别知识必须能解释和代表该区域社会进程中真实的变化。

迄今,关于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史的关系,中国学界做了诸多探讨,在理论范式、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sup>①</sup>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发,也留下了可资拓展的空间。本文试图在总结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研究关联的基础上,论述世界史及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方向,并借用《安南史研究》和《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中的案例阐明世界史和全球史视阈下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原则,从而为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 一、世界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联

在国外,“世界史”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它强调对人类历史的横向观察,着眼于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因此与“全

---

① 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第3—19页;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方法》,《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2期(总第4期),第172—196、228页;韩东育:《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山经验与自我实践》,《学海》2022年第2期,第42—46页;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10页;谢韬、陈岳、戴长征、赵可金、翟崑、李巍:《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35、155页;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1期,第79—88页;江时学:《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2期,第1—27页;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4—160页;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53—73页;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35—49页;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18—28页;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0—160页;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第85—95页;郑春荣:《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改进思考》,《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梁占军:《构建区域国别学,世界现代史大有可为》,《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8—12页等。



球史”“整体史”有相近的含义。但在中国，“世界史”却有其特定含义，它专指“中国之外的历史”，也就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sup>①</sup>世界史研究着重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结构的构成和演变，其视角基本上是在二维平面上的扩展，研究总体上局限在历史学的范畴内，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主。全球史则突破了国家体系的限制，以跨文化、跨民族和跨地区间的联系和互动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强调空间感，属于三维立体的范畴；同时，其研究也超越了历史学范畴，涉及许多学科领域，除实证方法外，还更多地运用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特别是比较分析法，因而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sup>②</sup>而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具有不同的周期性特征。其中，长周期议题关注议题本身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将议题处于宏观历史周期下进行观察。长周期议题涵盖某一区域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音乐、文学、民族和语言等领域，世界史在观察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长周期变化时，已经成为最受信赖、最重要的方法之一。<sup>③</sup>基于此，区域国别研究与世界史存在以下主要关联。

**第一，“国别”和“区域”是构成区域国别学科历史研究的车之两轮。**<sup>④</sup>首先，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已有数千年历史，国家的职能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这一政治联合体相继呈现出众多形态。将国家纳入其历史进程中进行观察与思考，能够使相关研究有历史感、有厚度、有经验支持，因而更加丰富、生动和客观。<sup>⑤</sup>例如在东南亚，先有国家，后有民族，国家主导民族的形成。与经典现代国家之形成强调领土主权、政治法律官僚机构不同，前殖民主义时期的历史中，东南亚国家各自的形成与知

① 钱乘旦：《世界史研究的时代关怀》，《人民日报》2014年4月13日，第5版。

② 梁占军：《“全球史”与“世界史”异同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2—3页。

③ 王晋：《议题与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第111页。

④ 孙江：《区域国别学发凡》，《学海》2022年第2期，第25页。

⑤ 郭树勇等编著：《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识构建，更多强调的是东南亚本土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要素。<sup>①</sup>而对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而言，荷兰殖民统治是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在荷兰入侵前，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和王朝可以完全统治这一地区，甚至印度尼西亚（Indonesia）也只是一个拼凑而来的准希腊式名称而已。在文化、政治、历史上尚未达成统一的情况下，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接手了这片被荷兰人统治过的地区。在这里，荷兰并非只是一段历史插曲，对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主权来说，荷兰等同于亲生父母。<sup>②</sup>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各个民族主义在扩大主导领域，而帝国的行政单位早于一步将它们统一了起来”。<sup>③</sup>

其次，历史是一种重要的区域构成要素，不同的国家或区域因共同经历某一特定历史而拥有“共同的历史观”，并基于此进行跨国或跨区域活动。共有历史基础上的区域体现了国家或区域共同发展经历和相互间关系，也体现了国家、民族、文化的不同以及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例如，维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认为，从9世纪至19世纪初，东南亚大陆国家在经历3次分裂后，在领土、行政、文化上变得更加统一，同时期的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欧亚大陆两端，各个区域出现了“奇妙的平行”现象。<sup>④</sup>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传统的区域划分相对化，把从印度东北部到东南亚大陆的广袤山地称为“赞米亚”（Zomia），认为当地居民的历史充斥着对平原国家统治的逃避与反抗，可将之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在世界其他山地和海域也能看到类似的非国家

① 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7页。

② 迈克尔·瓦提裘提斯：《季风吹拂的土地——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张馨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1页。

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45页。

④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2009.



圈。<sup>①</sup>上述成果均以东南亚大陆为主要对象，但学者们主张这样的历史过程模式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他们尝试从不同角度诠释全球史。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基于反对殖民统治和外来干涉的历史经验，强化域内交往，这为东盟的成立提供了重要动力，并促使东盟国家利用东盟这一区域组织实现共同诉求。21世纪以来，东盟国家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更增强了东盟国家推动东盟发展的信心。因此，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并非只是“想象的共同体”。<sup>②</sup>

概言之，基于当下国别史框架无法容纳的诸多问题，为探讨其来龙去脉，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需要侧重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跨界”问题，并追溯现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历史。构成区域国别学另一翼的是对“区域”的研究，区域国别学要拥抱“区域”研究的“空间转向”，<sup>③</sup>把区域研究的新观念注入其历史研究中。尽管上述两翼为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但若想让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世界史成为众所瞩目的领域，全球史和跨国史应成为其主导方向。<sup>④</sup>

**第二，世界史学科自从诞生之日起，更与民族国家关系密切，二者同舟共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自身的历史非常关注，虽然世界各地存在很多研究过去历史的方法，但世界史学科源于19世纪的西欧。德国和法国相继梳理了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叙述框架以及史料批判的方法，此后，世界史研究与西欧各国参与全球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行为逐渐融合，并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当然，这并非单纯的模仿或转移。世界史研究方法与此前各地业已存在

① 詹姆斯·C.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② 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5、65、73、163页。

③ Katja Naumann, “Global History and the Spatial Turn from the Impact of Area Studies to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5, No. 1, 2010, pp. 1-22.

④ 孙江：《区域国别学发凡》，《学海》2022年第2期，第25页。

的类似的学术研究方法相互融合，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研究的视角和重点进行了诸多改良，促使之前比较零散的世界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术体系。例如，日本世界史研究的特征是基于严密的史料批判和一手资料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而美国世界史的特征在于非常重视研究论文或书籍的整体结构。<sup>①</sup>

在 17 世纪的欧洲，“主权国家”理论逐渐抬头。所谓主权国家就是这样一种主体，即用明确的边境来环绕其统治疆域，对于外部而言，君主代表国家，且不认可有比自己更高的权力存在。主权国家对于罗马教皇也做了如下主张，即主权国家在自己的疆域内，连宗教信仰也可自行决定。主权国家之间以边境线来区别和划分领土，人们也能够强烈地意识到领土的“内”和“外”。以国王为顶端的一元化政治权力，并且拥有固定疆域的主权国家，由于国王权力增强，慢慢地开始使用“绝对王权”这一词语。城市和贵族开始属于某个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之间也逐渐产生了“外交”和“国际关系”，人们都变得拥有了“国籍”。<sup>②</sup>

利伯曼认为，从 18 世纪后半期到 19 世纪初期，东南亚大陆地区出现越南阮朝、暹罗曼谷王朝、缅甸贡榜王朝三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他们出现的过程与 15 世纪以来的国家统一现象有共同之处。在这些国家内部，不仅是政治体制，文化和经济也逐渐统一。<sup>③</sup>对此，其他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国家内部孕育了多样的文化和民族意识并经历了长期的相互斗争。这些国家经过殖民时期，直到现代都没有太大变化，因而被称为“原型民族国家”（prototype nation state）。此外，卡蒂利坦比·威尔斯（J. Kathirithamby-Wells）和约翰·维利亚斯（John

① 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孙若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8—39 页。

② 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毕世鸿、李秋艳译，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17—318 页。

③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2009.



Villiers)把以东南亚港口作为收入和权力源泉的国家称为“港埠政体”(port polity),进而对很多当时开放且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国家制度和网络进行探讨<sup>①</sup>。彼时的国家曾被视为当地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但现在却逐渐成为促进经贸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主体,在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虽说由于国家、语言或地区的不同,历史学的社会作用都会产生微妙差异,但一般而言,历史学在19—20世纪这段时期内,对西欧或日本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将“越南”或“印度”等“国家”作为研究框架,将这些国家发生的往事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并赋予其含义,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由此,作为“我们的国家”的越南或印度的历史就会成为“越南史”或“印度史”。这或许是因为所有人都承认越南或印度等主权国家的存在,并且该国所有人都认可自己属于这里、都有相似的民族意识,这两种现象相辅相成。<sup>②</sup>

19世纪以后,全世界许多大学对历史的研究和教育逐渐盛行,这种转变与民族国家建设不无关系。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并描述本国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对一个国家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二战后,东南亚各国要求其统治的正统性来自全体民众自发产生的民族主义历史。据此,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研究致力于确立“民族”的历史(国别史),将殖民统治时期刻画成充满压迫和反抗的“时间”。<sup>③</sup>因此,传统的“世界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别史”的综合,它对地球上各区域文明演化的相互关联和互相影响研究得较少。<sup>④</sup>

① J. Kathirithamby-Wells & John Villiers (eds.), *The Southeast Asian Port and Polity: Rise and Demis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依寛司:『脱植民地主義のベトナム考古学:「ベトナムモデル」「中国モデル」を超えて』、風響社、2014、第377-378頁。

③ 山本信人編:『東南アジア地域研究入門3:政治』、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7、第41頁。

④ 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117页。



第三，学者们在运用世界史研究方法论述区域国别的历史时，必然是察今知古，会基于现代视角，大量使用现代的知识、概念和语言。时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和地区都不会以同样的速度流逝。时间被人类认识、被选择性记忆、被赋予意义后成为历史。既然是基于人类的认识，则历史也和人类创造的其他概念一样是可变的。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及其认定书写历史，但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不管如何书写，都会成为区域国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无可厚非，过去的历史必须基于现代视角进行阐释，且这些解释都只能由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作出。不仅是历史学者，普通民众在理解曾经的历史时，也经常会使用之前并不存在的概念，或是古今意义大相径庭的语言，又或是当时还尚未诞生的语言。换言之，让现代人以古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过去犹如天方夜谭。<sup>①</sup>

古田元夫对世界史中的区域划分作出如下论述，“基本而言，区域划分是为了方便学者进行研究，其范围具有可变性和多样性。学者根据问题的具体历史条件，将区域划分为比单个国家小的地区、跨境地区、包含众多国家的区域等各类区域，并深入探讨其多重结构”，并将上述几类地区称为“作为方法论的地区”。<sup>②</sup>此外，大桥厚子和太田淳从经济层面的广泛联系，考察了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爪哇岛西部的地方社会变化。在近世到近代的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起到了连接近世海域史和近代亚洲贸易论的桥梁作用，引发了人们重新审视19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扩张和融入世界经济这一传统历史观。<sup>③</sup>

① 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孙若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页。

② 樺山紘一編：『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ーチ』、岩波書店、1998年、第42頁。

③ 大桥厚子：『世界システムと地域社会：西ジャワが得たもの失ったもの1700-1830』、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0年；太田淳：『近世東南アジア世界の変容：グローバル経済とジャワ島地域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

阿里克谢·维克 (Alexis Wick) 在讨论为什么没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红海区域的研究这个问题时认为, 首先, 红海直到现代才被认为是“海洋”, 而海洋文明属性可以被视为欧洲之专属。其次, 欧洲人的长期观念之一是, 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是大陆帝国, 那些被认为和海洋有关的东西, 被默认为与奥斯曼帝国无关。再次, 红海正好处在欧洲地理学的两个区域, 即阿拉伯地区和非洲的分界线上, 长期无法建设一个独立的、整体的红海区域观。维克指出, 另外一个因素是即使是在现代红海也没有成为某个民族国家所专有的区域, 因此, 红海不可能单独出现在一个国家的档案里。维克认为, 即便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长期没有关于红海区域的整体性观念, 但是, 奥斯曼帝国对这个“区域”一直有其从自身出发的关切, 即在奥斯曼帝国的日常生活里, 对红海这个“区域”, 并不是后来欧洲区域国别研究所理解的那种帝国中央如何控制某个地方的问题, 而是一系列其他关系的叠加。维克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红海区域历史出发,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和学科进行批判。<sup>①</sup>

又例如, 世界各地都有与现代汉语中的“首都”一词相近的概念, 但由于时代或区域的不同, 这些词语的意义都会产生微妙的差异。如果我们单纯地认为“17世纪萨非帝国的首都是伊斯法罕 (Esfahan)”, 那么就必然与彼时当地的实际状况不符。因为在某些国家, 国王所在的地方就是王朝的政治中心 (并非“首都”), 而且这些中心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移动。因此, 罗马帝国、莫卧儿帝国 (Mughal Empire)、蒙古帝国、印加帝国 (Inca Empire) 等不同语言中的“帝国”一词, 其含义也并非完全一致。可以想象, 彼时当地的人们在指代各种不同的政治权力时所使用的概念肯定不是“帝国”一词。当我

---

① 咎涛:《区域国别研究: 学科建设如何走出新路》,《光明日报》2022年1月15日, 第10版。



们在研究地区或国别的历史时，必须意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障碍存在双重属性。<sup>①</sup>

## 二、世界史及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方向

世界史及全球史在探究域外知识方面的前期积累，为其率先深度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区域国别研究则为切实发挥世界史的咨政功能、拓展社会服务提供了路径。概言之，世界史助力区域国别研究的自身优势有三：其一，历史学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洞察现实问题的本质，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线索；其二，现实问题研究需要广泛收集材料和信息，史学研究用材料说话以及言必有据的专业训练，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打下坚实的资料收集以及分析论证基础；其三，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预测需要材料依据，更需要见识和智慧。丰富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历史发展脉络和走向的长时段把握，有助于帮助我们研判形势，提升对策建议的准确性，这是史学咨政的重要功能。<sup>②</sup>那么，如何实现世界史及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有机结合？可从全球史的视角，将地球视为统一整体（即全球史观），强调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区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sup>③</sup>对于

① 羽田正：《全球化与世界史》，孙若圣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页。

② 梁占军：《世界史视域下的国别区域研究》，《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4版。

③ 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18页。钱乘旦提出的构建新的“世界史”学科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该学科要考察人类的整体历史，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详情参见钱乘旦：《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第7页。

区域国别研究而言，首先，要从全球、全世界的角度来面对和分析某一区域或跨区域的历史现象，要注意局部历史表象背后潜在的普遍联系和深远影响。其次，在注重国别史、区域史、断代史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跨区域、跨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或现象。<sup>①</sup> 以此为前提，有以下四个方向可供选择。

**第一，关注人类集团之间的关系或相关性，重视采取“接续的历史”方法。**时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和区域都不会以同样的速度流逝。时间在被人类认识、被选择性地记忆、被赋予意义后成为历史。既然是基于人类的认识，那么历史也和人类创造的其他概念一样是可变的。随着认识的变化，时间的流逝会改变其质量和速度。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对世界史的固有理解和叙述，即合理运用多种语言书写的、立场各不相同的历史资料，将迄今为止分门别类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的国别史或区域史视为关系更加紧密的事物。<sup>②</sup> 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对历史资料的解读必须基于当地历史文化，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许多先驱性成果。而且以既有的民族国家为单位对历史进行回顾的做法也取得了类似效果。<sup>③</sup>

世界存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们过去各自独立、互不影响。这些既有认知固然重要，但在预测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时，单凭既有的认识难言充分。当人类在培养对某个集团的归属意识时，历史认识就会发挥关键性作用。从19世纪到20世纪，如火如荼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世界各地仍然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例如国家间冲突、世界经济下滑、自然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传染病、恐怖主义等。就单个国家或区域之层面而言，无法凭一己之力有效处理上述难题。如果各国人民能够培养

① 杨巨平：《“全球史”概念的历史演进》，《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第113页。

② S. スブラフマニアム：『接続された歴史—インドとヨーロッパ』、三田昌彦・大田信宏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年、第9頁。

③ 羽田正編：『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と東アジア史』、東京大学出版会、2016年、第28-30頁。



自己是“地球村居民”的意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世界观、全球观，放眼世界、携手合作，那么各国各区域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的各自为政、再三拖延等现状必然会得到极大改善。<sup>①</sup>

**第二，尝试排除中心性，即在考察区域国别历史时，不以特定区域为中心，尽可能平等看待所有区域和人类。**<sup>②</sup> 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都将文献资料较多的领域，即存在强大政治权力的领域视为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国史是区域国别研究转向的一种尝试，<sup>③</sup> 是去民族国家中心化的一种努力。因为这些研究试图消除当代世界仅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理解。此类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集中研究全球化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的技术和人员流动的路径和流向。<sup>④</sup>

全球化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将以往区域间关系中常见的多层性全部作为同类“区域”加以考察。全球化虽然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但同时也解放了区域。换言之，全球化使各区域脱离了既有的等级秩序，使之能够以更多样、更自由的形式交流，这才是全球化最大的价值所在。在此过程中，全球史（Global History）等问题开始在发达国家出现。其实这些问题大多是其学者以全球化为契机提出的，例如，16—17世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通过何种方式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成为促进全球贸易的资本。<sup>⑤</sup> 由此可见，全球化的问题也会对世界史研究产生影响，学者们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全球化

① Haneda Masashi,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 Vol. 3, No. 2, 2015, pp. 228-229.

② 羽田正：『新しい世界史へ—地球市民のための構想』、岩波書店、2011年、第29頁。

③ 跨国史通过关注民族国家的跨国联系来考察外来力量对民族国家成长的影响，以加深和丰富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消除民族国家史学的狭隘性和封闭性，考察历史上的跨国现象和跨国联系，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这种意义上的跨国史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史学分支。详见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第11页。

④ Fiona Paisley & Pamela Scully, *Writing Trans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p.6.

⑤ 倪来恩、夏维中：《外国白银与明帝国的崩溃——关于明末外国白银的输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检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46—47页。

的视角投射到世界史研究中。在此情况下，以往处于国家这一主要研究对象之外的区域就会被置于全球史之中。滨下武志认为即便受殖民统治影响，亚洲在16—18世纪也发挥了全球性作用，因而能够在全球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全球化现象极大促进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以此为基础的全球史从欧洲、美洲或亚洲的视角重新解读世界史。全球化以何种形式对全球性的历史认识施加影响？该问题也关系到学界对金融和移民的认知。全球化的一个新特征就在于如今的移民早已不是旧时代的劳工移民，而是身怀资金和技术的新移民。<sup>①</sup>

迄今，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其职业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撰写国别史是其主要工作。自二战后以来，现代民族国家便一直引导学界要对所学知识进行产出、分类和保存，现在学界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做得更好。然而，全球化时代无法继续维系那种民族主义的历史，因为这一历史既抹杀了人们过去的种种联系，也忽视了人们现今对地球的共同责任。<sup>②</sup>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需要以非民族主义历史为主题建构一种迥然不同的世界史，东南亚、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无疑是绝佳的起点。

**第三，基于“地球村居民”的立场和视角，求同存异，发现和强调各区域、各国的共同点。**各区域、各国之间的差异虽是客观事实，迄今的世界史热衷于揭示某个人类集团或社会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即使学习了世界史，人类也不会只因为意识到了国家、区域以及文明的差异，就认为自己是地球村的一分子，<sup>③</sup>进而认为未来可以关注其共同点。如果地球村对人类而言真的非常重要，那就需要构建全

---

① 滨下武志：「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下の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課題」、『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0号（2011年1月）、第26頁。

② 安东尼·瑞德：《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宋婉贞、张振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頁。

③ 塞繆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甚至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这在各国引起了巨大争议。详见塞繆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侯井天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新的世界史，这将使“地球村居民”这一归属意识更加明确。据此，世界史有理由成为全体地球村居民携手解决难题的理论依据。<sup>①</sup>

例如，泰国的曼谷市、清迈府等都是泰国国内的行政单位，都拥有独特的历史，并编撰了本地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与通常意义上的国别史——“泰国史”是共存的，但“泰国史”并非由曼谷、清迈等地方志简单相加而成。真正的“泰国史”是将泰国视为统一的整体、将整个泰国作为历史论述的单位。泰国地方志和泰国史显然是不同层次的论述单位。同理，学界要继续编撰泰国、尼泊尔、东南亚等各国、各区域的编年史，但这些“国别史”或“区域史”不能直接组合成世界史。世界史应始终将全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就像从宇宙中观察地球一样，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去描述某个时代的全体人类社会。

在目前的世界史中，如果将越南阮朝作为论述框架，就必然会涉及其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要想梳理清楚越南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上述框架就比较自然，也是正确的历史解读方法，切不可主观臆断目前的某些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在王朝国家的框架内讨论政治或社会或许可以勉强为之，但若探讨经济和文化就显得不相适应。而在讨论政治时，即使将阮朝作为分析框架，当地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以及跨国贸易网络也早已远远超过了阮朝的统治疆域。

据此，我们也可以考虑放弃迄今的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性框架，直接探讨单个国家或区域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及其价值。例如，通过彻底解析某个村落的历史，从而阐明国家或世界的权力结构在各个时期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换言之，从不同的个体之中探寻其共性之所在，这是世界史的重要方法。<sup>②</sup>最重要的是，如果将人类古代社会的情形与现代社会进行对比，现代社会的特

---

① Haneda Masashi,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Asian Review of World Histories*, Vol. 3, No. 2, 2015, pp. 228-229.

② 吉澤誠一郎:「東南アジア史を求めて」、『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No.33、2004年、第142-143頁。

征便会一目了然。如果我们能够积极采用全球史的研究范式，不拘泥于单个国家或区域，或许能够避免区域国别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一些弊端，并为重构面向未来的世界史理论及其方法体系作出些许贡献。

**第四，在巩固“纵向历史”的基础上，加强“横向历史”的研究，使二者相辅相成，继而回归宏大叙事。**世界史应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理解当今世界的特征，通过比较的视角来描绘过去所发生的历史。生活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在不断意识到世界整体的同时，从事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有鉴于此，在论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之际，就有必要把世界整体的状态作为世界史来看待，并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重现。就像泰国史或越南史那样，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时间为轴来开展研究。这就是所谓“纵向历史”研究方法。但是，针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区域的历史，通过横切的方式来论述世界整体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即“横向历史”研究方法的应用，对某个时期的人类社会进行横向研究将成为主流。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吴于廑就指出中国世界史学科对于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吴于廑认为，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纵向发展与世界各地区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从彼此分离到逐步联系密切的横向发展共同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sup>①</sup> 据此，吴于廑将人类历史分为“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指出世界史研究应侧重于后者，即人类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但这种“横向历史”的研究方法，由于涉及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国与国乃至区域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等因素，鲜有人尝试。为了克服观察历史的偏见，切实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要使世界史纵向的发展和横向发展辩证地结合起来。<sup>②</sup> 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面，通

① 吴于廑：《世界历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 1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 页。

② 陈志强：《论吴于廑“整体世界史观”》，《世界历史》2013 年第 2 期，第 54 页。



过将“纵向历史”和“横向历史”这两种方法进行巧妙的组合，我们就能够将世界整体的过去作为“世界史”，继而获得立体的、综合性的理解。

例如，羽田正在《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一书中认为，世界的一体化潮流始于16世纪以后，并一直持续至今。其后400年间，受这股巨大潮流的冲击和影响，地球和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7世纪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伴随这股潮流相继成立，推动这股潮流向前发展，并最终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深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该书不是对单个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也不是对东印度公司某一方面活动或影响的研究，而是围绕17、18世纪整体世界的初步形成进行的综合分析。<sup>①</sup>需要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研究，尚未摆脱欧洲中心史观、日本中心史观、中国中心史观等观念的束缚，如果想要研究涉及全球的历史，仅依靠既有的某个国别、区域或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恐怕难以达成目标。因此，对于东印度公司这样涉及全球历史发展进程的某个要素，也只有通过描绘“一体化的世界”，即采用全球史观，才能看清其本来面目。

### 三、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原则

在推动世界史及全球史和区域国别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过程中，结合世界史学科的既有经验，需要把握好以下主要原则。

**第一，纲举目张，聚焦重要问题、真问题。**与其他学科一样，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步是选题，选题首先要考虑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首选重要且为人所关注的问题。对于“游尘土梗”之类的细枝末节的研究，容易导致在总体上流于零碎，如果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或主流趋

---

<sup>①</sup> 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毕世鸿、李秋艳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iv页。

势长期停留于这种状况，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受到局限。

例如，山本达郎在《安南史研究》中为何会选择元朝和明朝时期的中越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山本认为与朝鲜、日本相比，越南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更为密切，而元朝、明朝同越南之间的战和关系最为频繁，并保留有丰富的史料。山本正是从这一出发点着手，参阅了大量中国史料的同时，还借鉴了大量越南史料，而且彻底地调查、比较了近代各国的研究成果。在篇首的序言中，山本就开宗明义指出选取元、明两代的越南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

之所以首先从安南与元、明两个朝代的关系进行研究，是由于该时期的史料较为丰富，通过对一些详细史实的研究，可为研究前朝的史实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无论研究中国统治下的安南历史，还是研究安南独立后的李朝和陈朝等朝代的史实，如能首先阐明元明两代中国征伐安南的情况，上述研究就会变得相对容易。<sup>①</sup>

**第二，实事求是，谨守“论从史出”。**金冲及曾指出，在历史研究中，一种是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穿靴戴帽”式地硬贴在对历史的叙述上，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另一种是把一些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理论框架硬套到区域国别历史论述头上作为装饰。这类雕虫小技未必能真正帮助我们加深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的理解。<sup>②</sup>因此，在运用世界史深化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要时刻警惕先入为主的想法，真正做到“论从史出”。换言之，就是以史料为基础，奉行

① 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 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毕世鸿、瞿亮、李秋艳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I 页。

② 邵建斌：《学问，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做——学习金冲及的治学之道》，《学习时报》2020 年 10 月 28 日。



“拿来主义”，秉承“上穷碧落下黄泉”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精神，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做到言必有据，信而有征，且在使用外文材料时要极尽推敲核对之能事，务求精审准确，力戒草率臆断。<sup>①</sup>

例如，在《安南史研究》的序编，山本达郎先从究明中国史料与越南史料二者对当时安南国王名称的记录出发，通过对比，找到二者时间、人物的对应。在探究安南诸国王的名称时，山本发现安南史料所记载的陈朝诸王，前后一共 13 人，而中国的史料记录却有 15 人之多，但之前学界却并未澄清，认为必须对上述相互矛盾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他强调，在对中越双方的政治交涉进行考察时，必须弄清当时的统治者到底是谁，这是展开分析最为基础的第一步。因此，山本将中越史料进行反复对比后认为，陈朝国王存在两种不同名号，其在与元朝交往时，无疑要尽量避免使用表示臣服的名讳。<sup>②</sup>

序编还对宋朝周密所撰《齐东野语》中“安南国王陈日照本福州长乐邑人”的说法进行了辨析，陈日照即为太宗熹。而针对《元史》将日熹先后记录为两代国王的情况，山本分析指出，因为当时安南与南宋和蒙元都有往来，日熹之前接受南宋册封，其后才接受元的册封，为了在史书上突出强调元的册封关系，因此在日熹之后加上了“光昺”。正是采取了“论从史出”的实证研究方法，山本证明了陈朝统治者隐藏其实名同中国王朝缔结朝贡、册封这一惯例。

**第三,万绪千端,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复杂性。**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过程中,其彼时的事实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学者们研究区域国别的这些事实,就得还原到其当时那种复杂而矛盾的环境中,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区域国别相关问题的本质。这些复杂而矛盾的多种因素,往往既对立又统一,同时存在

① 李剑鸣:《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第82、84—85页。

② 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 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毕世鸿、瞿亮、李秋艳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9页。

且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此，在研究工作中，要具备跨文化的“了解之同情”，就要多花些力气，抽丝剥茧，对事实细心地从多方面考察，反复斟酌。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存在过一些过分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的现象，即便如此，也不可把以前说得少的方面拔得过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物的发展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忽视支流固然不可取，但为求“新”而非求“真”，甚至哗众取宠地一味强调支流，本末倒置，则更不可取。在研究的过程中应重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尽量全面、真实地还原其原貌。

例如，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在对越南史地进行研究时，已经不再仅依靠中国方面的记载，而是想从越南史料同中国史料的对比、互证中，找到越南史地研究的突破口。在第一编中，山本参照对比《元史》《经世大典序录》《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大越通史》《越峤书》等史料记载。而第二编中，山本对比了更为广泛的原始史料，中国史料有《明史》《皇明实录》《皇明四夷考》《平定交南录》《越峤书》《抑斋集》等，而越南史料则有《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记》《大越通史》《安南志原》《蓝山实录》《大南一统志》等。但是，山本并不是盲目地采用双方的史料记载，他在序言中就指明了选用资料的原则：

在史料的选用上，笔者并没有使用作为安南正史的《越史通鉴纲目》，也甚少使用《大越史记》。笔者之所以大量引用《大越史记全书》，是由于该书较好收录了古代记事。关于历史上的地名，本书则专门参照使用了《大南一统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注释及《同庆地理志》中的地名。<sup>①</sup>

① 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 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毕世鸿、瞿亮、李秋艳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II 页。



由此可知，他是有目的地鉴别史料的价值，《安南史研究》正是在如此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旁征博引、精细考证的。除了运用近代西洋的实证主义方法外，山本还继承了中国史的研究传统。

**第四，比物假事，善用比较研究。**比较研究也致力于打破区域国别研究孤立静止的传统研究范式，以宏观视野动态分析区域间或国家间的差异性以及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任何区域国别研究都要以世界史为基础，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审视才有其价值。<sup>①</sup>近年来，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形形色色的区域主义和区域合作框架层出不穷，如何比较不同区域和区域化的发展规律，对于更好地构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sup>②</sup>因此，区域国别学需加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

例如，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第一编阐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经营南海的整体情况，山本指明元对陈朝的政策是以占城为据点，支配南海整体大战略中的一环，进而阐明了元朝与陈朝的外交及元朝出兵的详细经过。相对于“不知晓实地仅使用中国文献来研究”的学者，山本对陈朝方面的动向进行了详细解明，并对比中、越史料，加以正确的地理考证，实现了前者难以达到的精度。例如，在对元宪宗七年元军讨伐安南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山本就根据多方面的史料进行了判断，他先援引《元史》原文，“兀良合台入交趾，为久驻计，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越七日，日昃请内附，于是置酒大赏军士，还军押赤城……”。<sup>③</sup>接着，他又根据《马可波罗行纪》中将云南府（昆明）地方的城市称呼为“Yachi”，推断兀良合台退军所至的押赤城（Yachih）指的就是昆明。他还用语言学的知识来进行辅证，指出《华夷译语》“百夷馆杂字”条中将云南（昆明）称为猛车（Möng-chie），

① 陈恒：《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学海》2022年第2期，第35页。

② 赵可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布局》，《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26页。

③ 宋濂等：《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81页。

而羌族也称昆明为“Mung Chi”（即 Chi 城）。但山本并不满足于大致方位，他参考夏光南的《元代云南史地丛考》，指出押赤城是而今昆明城中在明代之前所筑的部分，即濒临滇池的古城。<sup>①</sup>

**第五，知行合一，勇于将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需要跳出细枝末节，从更大视角和更远距离来审视研究对象。坚持问题导向，把研究对象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把所论之事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清讲透。而在做理论探讨时，更需要在现实问题和既有理论之间找到连接点，把握其中的规律，从而推动区域国别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将其深刻内涵总结梳理揭示出来。

例如，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对具体时间、事件的考证十分精细，秉承了实证主义原则，即便是当时引领越南史研究的法国学界，也尚未达到如此水平。在细致分析了明与安南的战和关系之后，山本也从宏观的视角出发，总结了明朝未能像汉、唐那样长久统治安南的主要原因。其一，虽然明朝出兵安南于史罕见，其规模甚至大于汉、唐时代，但与此同时，明代时期的安南及南中国地区，相比汉、唐时代，其在开发程度上之差别也已经十分巨大，向安南进军已经比之前更为困难。其二，五代时期之后，安南人便摆脱华夏王朝的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到了明朝统治安南阶段，先后兴起了反抗的陈简定、陈季扩势力，以及将明军驱逐出境的黎利势力。其三，尽管明朝当时国力已达鼎盛，但其强制推行文化融合政策，所派官吏素质低下，无法将安南纳入正常统治体制之内。其四，经过南宋、元、明的征伐，安南人民族主义兴起，对抗中国之意识日益增强。他认为明朝对于安南的政策自永乐帝死后就逐渐走向消极和失败，这说明了征伐、经略安南不过出于皇帝的一己之私。山本对安南与明朝的研究，

---

<sup>①</sup> 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 I：元明两朝的安南征略》，毕世鸿、瞿亮、李秋艳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47 页。



以及明朝为什么会最终失败，进行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安南对抗中国的自我意识以及安南自身开发程度的提高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sup>①</sup>

综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须将历史与现实及其所代表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可将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如生态环境、贫困、疾病、安全等问题设置为研究主题，探讨其在不同区域、国家、人群、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历史发展、知识谱系及应对差异，并通过比较和区分，阐明人类社会的共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sup>②</sup>

## 四、结论

深度破解世界各区域各国的“历史基因”、促进中国智慧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构、为新时代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时代命题。<sup>③</sup>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各国各区域联系日益密切的新时代，各种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不时突显。<sup>④</sup>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别区域研究既是世界历史发展自身逻辑的产物，也是世界史学科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世界史的重要责任在于为理解当前区域国别提供素材，因此只停留在将区域国别的纵向历史收束在一起开展世界史研究，显然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及未来，世界史不仅需要阐明个别区域或国家的过去，也需要对世界整体的过去进行研究。

① 瞿亮、毕世鸿：《近代日本对越南的史地研究——以〈安南史研究〉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35页。

② 刘超：《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2日，第1版。

③ 李永杰：《提升区域国别研究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24日，第1版。

④ 张文涛：《全球史的兴起与当代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23页。

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经常会遇到全球化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问题，要面对各自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对象区域国别了解深度不平衡的矛盾问题，还势必受到诸如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等认知模式的困扰。面向新时代，我们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更需要体现中国关切和情怀的世界史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强中外学界多学科的多维对话与交流，理应得到重视，<sup>①</sup>从而在各种互动中不断深化我们的研究。展望未来，如何立足于全球史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继而促进区域国别研究和世界史学科的深度融合发展，将会成为推动交叉学科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值得学界同仁去努力探索和实践。

（责任编辑：段九州）

---

<sup>①</sup> 黄兴涛：《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融合发展的思考》，《光明日报》2021年7月26日，第14版。



## **Area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Bi Shihong

**Abstract:** In area-study disciplines, world histo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but also one of its important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Country” and “Area” are the two wheels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rea-study disciplines. Since its birth, th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has becom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states and has grown stronger. When scholars use world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to discuss the history of countries and areas, they will make extensive use of knowledge, concepts and languages based on a modern perspective.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combining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with area studies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or 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 groups and to adopt a “successive history” approach; try to exclude centrality, that is, when examining area history, do not focus on a specific area, and treat all areas and human beings as equally as possible; based on the position and perspective of “global village residents”, discover and emphasize the commonalities of countries in all areas;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vertical history”, strengthen “lateral history” research to return to the grand nar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area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principles of focusing on important issues and real problem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ory comes from histor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plexity of area studies, making good us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raising practice to a theoretical level. By adopt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global history, it will be possible to promote the better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and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s.

**Keywords:** Area Studies, 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 Transnational History, Successive History